

悦

读

YUE DU



《不得碎》《山海间》 作者:陈波来 出版社:南方出版社

在诗歌圈内,陈波来一直以他的诚恳赢得朋友们的敬重和喜爱。文如其人,这也是我喜欢他诗作的原因之一。沉稳、诚恳、内敛又义无反顾的情深,是他诗歌的特质。我更喜欢把他的《不得碎》和《山海间》两部集子当成中年书来读,“万般悲欣,山重水复”是书后记的结语,这两个词用于他中年史的概括其实是再恰当不过。不知道是不是刻意,《真诚》一诗排在诗集的第一首,不用暗示、不用敲打,甚至不用“说出第二个词”,满满的真诚从字里行间跃出,“我沉默的心已充满

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

——读陈波来诗集

■ 许燕影

鼓点”,“我的泪水随时夺眶而出”,饱经沧桑却真诚不改,这是他一贯的执着,所以随后《断句》里那种“迷恋竹篮打水”,明知是空却心甘情愿自坠深渊的一往情深很容易被释然。他以特有的执念在一场空里寻找到“有关青山与柴的譬喻”,在“匍匐的姿态和哭不出声”的黯然里,执信“破碎的水声,也有渍痕可寻”,读他的诗自然而然就会被带入他营造的静水深流中不能自拔。在《中年之躯2》,他用“半身的惶惑,拮据、卑贱与抑郁”以及“空洞的两袖”,为中年之躯做了定义,“事实上它已接近干枯和麻木”,转而借有年头的林木“变得迟疑与缓慢”的呼吸,抒发不惑与知命的哀叹。这种哀叹在《雪殇》同样出现,“雪掩盖铁质的冷,水泥地发灰的念头”,其实“也在掩盖自身”,最后不得不“很快交出疲软的冬天,那面映照万物的镜子”和“黯淡下来的自己”。

陈波来的诗看起来像是一种随性的抒写缓缓道来,其实是有着技巧上的缜密思考。他通常会在诗里先抛出一个引子,再一点一点去呼应,“镜子的光丢在旷野”就是《雪殇》一开始抛出的引子。他的诗句凝练不拖沓,更不随意叠加意象,干脆利落,但最后总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令整首诗浑然一体,同时又给出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参与,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张力。

其实,陈波来的诗歌语言并不热烈,甚至时常会以第三人称作为局外人不动声色叙述,这种沉稳的冷反而让人心灵冲击更大。《挖掘》里,他对挖掘过程用最简练的笔墨进行冷静描述:“中年的摇臂上不时溅起浪花”,“向最黑最深处的挖掘”,他要的是“多晶体的欲望”,但“足够贪婪的摇臂和铁铸的心肠”最后导致“挖掘本身成为

坍塌”,大地“伤口不时呻吟”,因贪欲,江山已不再妩媚,多么让人心痛。坍塌对他来说,是无助的痛,这种痛持续于《清明散句》,“他经历的灿烂,成了他足下的塌陷”,“他的一个个塌陷,有着一朝蛇咬的后遗症”,那些法事、纸片和揉碎的悲伤,“一把海螺压住了掌声和潮汐”,他还是“被留在他的最后一个塌陷里”。

诗贵在藏,可以说陈波来的藏技独到,使得他的诗更加耐人寻味。他有时也写轻快的诗,一些小情诗,依然是小小的藏让人心照不宣地莞尔。“只是少许不安”,“春天在桃花中走失,我提前有了流水之意”,是的,人面桃花是空洞的承诺,“春风抱住树枝哭”,“哭出包藏的祸心”,他克制从容地借《桃花诀》巧妙喻示出辞别伤情;除了风,没有别的声音,“除了别的声音,没有风”,“除了你,没有别的人可以爱”,这样的直叙也很智慧,只是题目,就已经意味深长了。不难看出,陈波来有很老到的写作功底。

除了天分,也应归功于阅历,有丰富的阅历才有丰满的人生。陈波来善于沉淀,兴趣也广泛,诗歌之外,散文诗和散文都有涉足。《山海间》是本散文诗集,篇幅大,都很短,像是顺手拈来,一篇篇翻读竟也爱不释手。

和诗歌相比,他的散文诗又有另一种轻柔明丽的举重若轻之美,生命的悲欢交集藏得更深。这种文体或许更适合给气息相投的人读吧。像《听风》,柔美到心疼,“断崖、深谷、风”,“一起听风吧”,却“怕她听见我内心的松动”,“怕她听见,流沙、落叶、崩塌的石头”。这里,又出现一次我偏爱的《除了风,没有别的声音》,他喃喃自语,“我要停下来,放下一些熟悉的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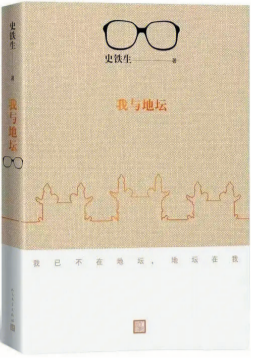
物”,“从我尘世的骨折处,磨出火花与沉默”,“索性把自己也放下,转而俯向草木与虫豸”,“除了相互安慰的风,没有别的声音”,他纠结着欲隐藏自己的心绪,又无法抑制内心的涌动,大致感人的诗作都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吧;而《听李尔王》虽然只有寥寥几行,却也神匠般把这个总失恋的老男人写得让人无比疼惜,“影影说,没人爱。她去山丘那边等着,她爱”;《五月》同样让人读到心折,一个将在五月抵达的人,“你会读到那黑色瞳孔中的火焰,那闪现的一瞬,你便明白了现在的出发和抵达,事实上他已漂泊多年”,然后你会发现,他摊开的手中,是一枚小小的果核,花季的种子;《事件》有诗语的凝练,“一滴水撞上坚硬的道路,一个开花的季节撞上亘古荒原,一句谏语撞上哑者的嘴唇”,“我看见那个我,困厄于无常的命运与琐碎的事件而似是而非”;灵魂逼视下的《我和你》发出了悲痛的拷问,“我缄口不语,你却从我口中说出玲珑圆润的话”,其实,“我只想人群中安巢,在诗歌里栖身”,“如果灵魂的逼视不显多余,那么,我又是谁”?逼急了,偶尔,他也会在《爱你》中用几个排列的“必须”强调他的磅礴之气,“但我必须走近你”,“我必须扯住你鸟翅一样颤抖的双臂”,“我必须掠走你”,“我当然要占有你!我必须如此”。感觉陈波来的散文诗相比诗歌,语境更轻,却更显情不知所起的一往情深。

我认定集子最后的《迎着秋风》呈现的正是生命的终极之痛:“秋天让一朵怀孕的花直坠于地”,“像我们,穷尽一生,该分离的时候骨肉分离”。那么,“四望皎然”,来去路上各自安抵,祝福。

祝福陈波来,谢谢那么多的好诗让我们分享了这弥足珍贵的一往情深。

在废墟中绽放

——读《我与地坛》



《我与地坛》 作者:史铁生 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上世纪90年代,在北京的角落里,地坛默默无闻地躺在时间的阴影中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地点,却孕育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。史铁生,一个因疾病而坐轮椅的青年,在这里找到了重生的契机,用文字铸就了他与命运抗争的传奇。他的作品《我与地坛》触动了无数人的心,引发了很多人对生命的深层意义进行反思。这种影响力穿越时空,至今犹在。

1972年,21岁的史铁生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瘫痪,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打击,但是他没有向厄运低头。在挣扎与绝望中,史铁生发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渴望一个独处的空间,而地坛承载了他的期盼。他说:“那个下午,我无意间踏入地坛,从此它成了我灵魂的归宿。”地坛为他提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避风港,让他能在静谧中与自己对话,反思生命的意义。

生活的无情逼迫史铁生多次搬家,但他总是选择离地坛不远的地方。地坛并非只是一个地理位置,它成了史铁生与世隔绝的精神家园,一个可以思考生命意义的地方。

地坛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坐标,它还成为了史铁生人生故事的象征,象征着从废墟中寻找希望,从失望中孕育新生的力量。能够发现自己的“地坛”,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(刘羽熙)

惊残好梦 生出欢喜

——读丰子恺《惊残好梦无寻处》

■ 李天臣

捧读此书,有一种恍惚,仿佛在滚滚红尘中,一抬头就看见湛蓝的天空中繁星点点,心一点点地沉静,欢喜一点点地涌上面颊。书中不仅收录了作者的手稿,还插入了大量作者的漫画。先生的画作造型简洁,画风朴实,幽默风趣,充分展示了其“曲高和众”的艺术主张和“小中能见大,弦外有余音”的艺术特色。

文中的句子更是美的。如,德富鲁花的《不如归》中,“离开下

面的朴树飞去的乌鸦哑哑的叫声,听起来也是金色的。两片蓬松的云从赤城山的背脊上浮出。”夏目漱石的《旅馆》中,“依理而行,则棱角突兀;任情而动,则放任不羁;意气从事,则到处碰壁。总之,人的世界是难处的。越来越难处,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。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,就发生诗,就产生画。”译文的魅力,在于赋予了作品新的生命和情感。

少年时,读丰先生的画,只是觉得有趣。随着光阴荏苒,历经世事之后再读清先生的画与文,反而有一种清风明月般的淡然与欢喜。先生的豁达与通透让繁杂的尘世归于纯净,让读者在接受一种高级的艺术享受之后,对世间更多了一份热爱和眷恋。

合上书页,内心油然而升起一个想法。做一个有趣的人,或许会遭遇更多的美妙。



《惊残好梦无寻处》 作者:丰子恺 出版社: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地理与历史的相逢

——读《渭河笔记》



《渭河笔记》 作者:张斌峰 出版社:西北农林科技大学

阅读张斌峰的散文集《渭河笔记》,感觉是在诗意的溪流里泛舟。诗意,既是这部散文集语言的底蕴和基调,更是情感跃动的浪花和思想涌动的涟漪。该书貌似写景,实则寻人;寻踪历史人物的足迹,探寻历史人物的精神品相。

山水草木,不过是舞台和幕布而已,演绎的却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剧情。张斌峰像是一位较真的考古学家,以独特的眼力和思想的触角,发现他人之忽略,捕捉他人之遗失,矫正他人之迷思,思考他人之未解。基于此,他的渭河系列散文,就有了厚实而扎实的根底,没有沦为走马观花式的口水化的游记,而是升格为一部集地理与历史于一身的地域风情录和历史人物志。

渭河流域,既具有独特的地理属性,又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。渭河流经之地,山川丰饶,沉积了许多历史典故和人文传说。站在这个地理与历史交相辉映的沃土,张斌峰以自己的使命担当,以求实的作风和思考的能力,描述渭河,书写渭河。于是一行行饱含诗意的文字,仿佛一丛丛从涓涓细流中生长,葱郁而柔韧地破土而出——渭河,在大地上流淌,也在张斌峰的心上和笔端流淌。(安黎)



《走向世界的挫折: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 作者:汪荣祖 出版社:岳麓书社

1876年,郭嵩焘奉命前往英国,在伦敦设立了使馆,他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。1896年,73岁高龄的李鸿章历时190天,访问了俄国、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法国、英国和美国等8个国家。尽管此前他从挚友郭嵩焘那里了解到西

先醒者的孤独求败

——读汪荣祖的《走向世界的挫折: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

■ 禾刀

方许多信息,但百闻怎比一见。

本书以郭嵩焘日记、诗作,以及同管国藩、左宗棠等名人的书信往来等为叙事基础。郭嵩焘在73年的人生中,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。面对国际风云变幻,晚清风雨飘摇,仕途上的种种挫折与磨难,郭嵩焘没有选择荣华富贵以求苟安,而是挺身而出,率先开化陈旧思想,努力拥抱世界。

1856年,郭嵩焘借道上海前往浙江筹集粮饷。这是一次意料之中的顺道,但上海的一路见闻却让郭大开眼界:洋人不仅仅有坚船利炮,大都还彬彬有礼,十分注重卫生,街区宽大整洁,住宅“雄伟不失温馨”……这与士大夫传统意识中的邪恶夷族形象有着颠覆性区别。接触越多,郭越笃信“洋人的文明实出中国之上”。

1876年,肩负赴英“通好谢罪”

的郭嵩焘意外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。此前他没有接受任何外交训练,也没有经验可循。不过,面对士大夫的口诛笔伐,郭嵩焘没有气馁,反倒充分把握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,将旅途见闻以日记形式汇集成为《使西纪程》。毫不意外,这些充满对先进文明溢美之词的文字,再度成为顽固士大夫阶层发起新一轮围剿运动的又一“铁证”。

郭嵩焘的许多见解超前太激进,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唤醒那些素来以天朝自居的愚昧士大夫,即便是思想相对开化的洋务派似乎亦难对此完全认同。不过,汪荣祖认为郭氏过于直率与固执的性格,助长了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矛盾。

传统士大夫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,骨子里无法接受郭嵩焘这样他人志气的“崇洋媚外”思想。相较于传统士大夫的顽固不化,洋务派似乎更能看到西方文明之长,但依然跳不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意识桎梏。郭氏一针见血地指出,洋务派“仅能考求富强之术,如枪炮船械之类,而昧于本源”。1872年至1875年,洋务派曾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远渡重洋赴美求学。终因无法突破守旧思维枷锁,幼童求学之旅半途夭折。尽管如此,这批幼童回国后仍成就斐然,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、铁路局长3人、外交部长2人、铁路官员5人、公使2人、铁路专家6人、外交官12人、矿冶专家9人、海军元帅2人、海军军官14人……成就纵然可喜,而求学活动未能坚持则让人唏嘘。

在汪荣祖看来,郭嵩焘所谓的争议性主要表现在,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清醒者,一旦认定,便义无反顾。所以他能率国人之先河,看清

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长处后,哪怕只是一己之力,也要努力从衣食、社交等方面付诸实际行动,极力融入西方社会,试图找到中国出路。

不过,郭嵩焘越是努力,越显孤独,汪荣祖称其是“寂寞的引路人”。作为晚清士大夫中的先醒者,郭的这种觉醒远超同时代那些倡导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“洋为中国”的洋务派。当然他也有局限性,他不同于左宗棠和曾国藩,他的见识更多局限于理论层面,或者说他看得远,洞悉时代潮流方向,但在将超前见识转化为可行性行动方面,又似乎缺乏足够的智慧。

1891年,郭嵩焘走完了人生旅程。他的那些先见之明,虽然没能得到同时代的认同,但却像种子一样,在华夏大地播撒并悄悄孕育。四十多年后,虽然国力依然羸弱,但一位熟读国际法律知识、英姿勃发的年轻人——顾维钧站在了巴黎和会的舞台上,按照西方思维慷慨陈词,大放异彩。顾维钧是中国第一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素养的外交官,这也是他外交生涯职业成就的关键所在。郭嵩焘当年虽然受挫失败,但他极力倡导的外交理念,终于生根发芽。